

“京东云配”、“京东车会”重磅发布京东双轮驱动发力汽车后市场、三头六臂完成超3000万元A轮融资、甲乙丙丁获满帮集团3亿元A轮融资……近期的这些新闻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汽车后市场被看好，众多企业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然而高额的市场增速之下，汽车后市场却暗藏杀机。互联网开始介入汽车后市场之后，传统4S店与互联网O2O争斗不止，汽车配件企业的电商化也进一步撕开了柠檬市场严重的线下场景。

【柠檬市场】

柠檬市场也称次品市场，也称阿克洛夫模型。是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会止步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柠檬市场效应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

· 观世界 ·

美国

摩根士丹利下一任CEO浮出水面

据彭博称，摩根士丹利的Ted Pick被升为所有投资银行家和交易所所在部门的负责人，作为首席执行官James Gorman潜在接班人，他的地位得到巩固。

在现年49岁的Pick带领下，摩根士丹利股票交易业务过去四年在华尔街投行同类业务中排第一，2015年以来他还领导该行固定收益业务实现复苏。周二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他的新角色增加了监督交易撮合业务的职责。现年57岁、同样被认为是CEO候选人之一的Franck Petitgas则被任命为国际业务负责人。

现年59岁的Gorman一直在培养高层管理人员，从中发掘接班人，不过他也暗示自己还打算再干几年。Pick在股票交易业务方面的成功使他成为领先的候选人。在2015年负责固定收益部门后，Pick在该部门裁员约25%，并组建了新的管理团队。他的努力从去年开始显现成效，在华尔街投行中，摩根士丹利固定收益业务的收入降幅最小。

“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经验和技能是维持摩根士丹利未来成功的关键”，Gorman和该行总裁Colm Kelleher在备忘录中称。摩根士丹利前任任命银行家Dan Simkowitz和Jon Pruzan分别担任资产管理业务的负责人和首席财务官。

日本

人事院修改规则限制公务员加班

日本人事院为了遏制国家公务员加班，将修改人事院规则，拟设置原则上每年不得超过360小时，业务量难以减少的部门每年不得超过720小时的加班上限。此举可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推进国会改革。新规则将从日本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实施的2019年4月开始适用。人事院预定最早8月向首相安倍晋三报告新规则。安倍把劳动方式改革视为政权的重要课题，计划由政府和企业携手推进改革。

关于国家公务员的加班时间，日本2009年出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方针。规定正常每年不得超过360小时，需要应对国会答辩等“特殊情况”的部门每年不得超过720小时。

对于加班时间容易受到繁忙期和业务量左右的政府部门公务员，允许在“每月不超过100小时，每年不超过720小时”范围内加班。应对大规模灾害等不得不加班的情况被排除在限制对象之外。

在日本政府内，经常加班、工作环境恶劣的部门被敬而远之，难以吸引到有能力的人才。人事院2017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务员白皮书》显示，2017年度国家公务员综合职务考试的报名人数从2012年度的2.51万人减少至2.34万人，倍率也有所下降。

意大利

新生儿连续第三年不足50万

法国《欧洲时报》7月10日报道称，根据意大利中央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关于人口统计的年度数据，该国2017年的新生儿连续第三年不足50万人。如此之低的出生率自1861年意大利统一以来从未出现过。如果这一趋势长期持续，意大利将变成一片“荒漠”。

根据意大利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意大利共有居民60483973人，其中包括500多万外国公民。外籍人士占到居民总数的8.5%（这一数字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为10.7%，在南部地区则为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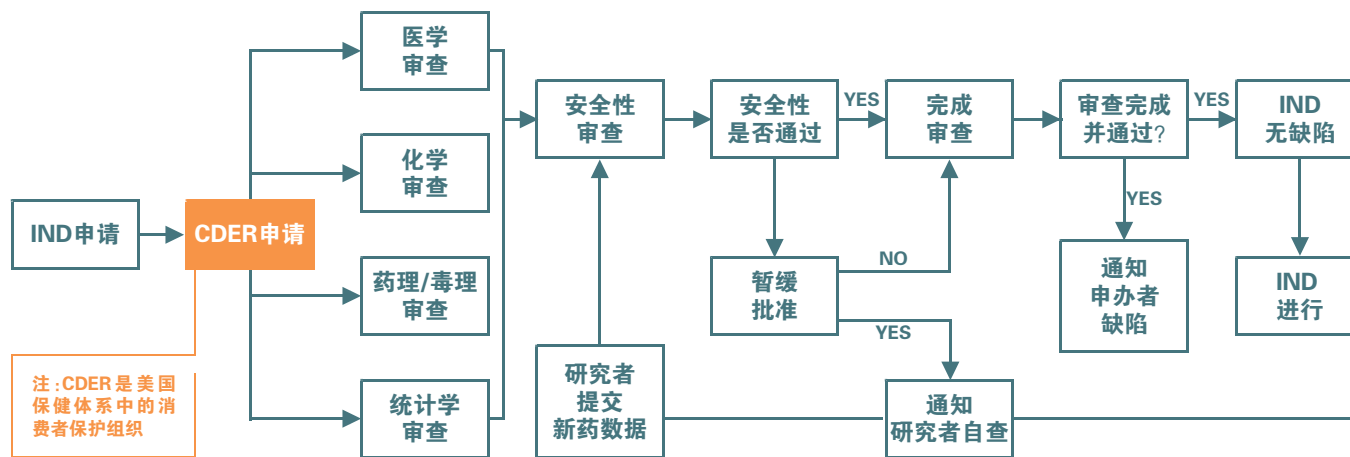
报道引述意大利今日网消息称，如果这一趋势长期持续，意大利将变成一片“荒漠”。总体而言，2017年意大利的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105472人。而总人口下降是由意大利籍人口的下降决定的。一年时间里减少了202884人，而外籍人口则增加了97412人。

据报道，2017年，意大利总人口自然出生和死亡率出现了20万的负差，即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了20万。其中，外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率成正差，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为6.1万；意大利当地人则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逆差：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为负251537。

据新华社

解密幕后“药神”FDA

▼ 提出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走进门时，是互不相识、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当审核过后，走出FDA的大门，审查成员和药企却成了利益攸关的双方。近日，世界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连发两文“控诉”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旋转门”引发热议。作为全球最公正、最权威的新药审批机构，FDA制度的严格人尽皆知。虽然审批法案不断更新，但如何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和推动医疗创新仍旧是FDA面临的永恒议题。

“迟到的利益”

《Science》在调查报告讲述了一名曾经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陆军士兵，因为“药物混合中毒”于2011年去世，这些药物中就包括AstraZeneca公司最畅销的抗精神病药物Seroquel。在Seroquel被批准上市前，由于曾有类似心脏死亡的记录，两名FDA审查委员会顾问曾纠结是否给出同意牌，但因为AstraZeneca极力声称这只是最坏情况下的最小概率，最终Seroquel获得批准上市。

上市后临床应用证据显示，心脏猝死问题是真实存在的。2011年，FDA要求增补Seroquel严重不良反应标签中应当添加警示“心脏猝死”严重不良反应。

FDA与AstraZeneca公司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根据《Science》披露，在随后的几年中，不少FDA的审查顾问收到了来自AstraZeneca及其竞争对手的财政支持，最大的一笔流向了曾经参与审查的心脏病专家Christopher Granger，其中6300万美元来自AstraZeneca，130万美元来自竞争对手。

这种隐藏在FDA审查之后“迟到的利益”绝非仅此一例。《Science》对2013—2016年间美国联邦“公开支付”网站的记录进行分析后发现，107位在此期间参与FDA新药审查的专家中，有40人后来从新药制造公司或其竞争对手那里获取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有26人获得的资金数额超过100万美元，更有7人获利逾百万美元。

高标准的证明

八年前的7月，在马里兰州的某酒

店，由8名审核人员（7名医学专家和1名患者代表）组成的审核团队，正在审核一种心血管方面的新药。这一组审核人员所做的工作，是FDA几十个审核团队的日常。

一直以来，作为最权威的国际医疗审核机构之一，FDA执掌着全美甚至全球的健康命脉。通过FDA认证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产品，被公认为是对人体有效且能确保安全的药品，是品质与效果的最高标准证明。

FDA评审人员在药品审批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整理递交资料和数据，向评审专家委员会提供证据或按照FDA的规程做出是否批准上市的决定。

FDA的高声誉来自于美国严格的新药审批制度。当一个化合物通过了临床前试验后，需要向FDA提交新药临床研究申请，以便可以将该化合物应用于人体试验。

如果在提交申请后30天内FDA没有驳回申请，那么该新药临床研究申请即被视为有效，可以进行人体试验。所有临床方案必须经过机构审评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审查和通过。每年必须向FDA和IRB汇报一次临床试验的进程和结果。

每一项新药在上市之前，经过多次动物及人体临床试验安全后，才能正式向FDA提交新药申请。期间FDA的审查委员会审核全部的实验数据，以及药品的代谢机制数据，并且会进行实地考察，从公司资质到产品生产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提问。

一旦FDA批准新药申请后，该药物即可正式上市销售，供医生和病人选择。但是还必须定期向FDA呈交有关资料，包括该药物的副作用情况和质量管理记录。对于有些药物FDA还会要求做第四期临床试验，以观测其长期副作用情况。

评审员的去向

为了避免身陷与医药企业的纠缠，FDA也有一套严格的审查程序，以避免财务关联。在聘请新药评审顾问时，会审核他们是否与医药公司存在财务关联度，要求顾问小组成员提前

披露其与制药公司的财务关系，且必须证明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和完整性。

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称：“FDA这个制度是完善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并不意味着这一套制度就是有问题的。”

《Science》称“事后付费”模式很少被发现，这就让医药公司有机可乘。《华盛顿邮报》曾报道，2012年，制药商们花在美国消费者身上的费用仅30亿美元，而据估计直接面向医疗专业人士的营销费用高达240亿美元，是前者的8倍。

就FDA本身而言，一方面设有严格事前审查机制，但对于事后评审委员的去向却很少把控，他们在评审后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如“跳槽”去医药企业工作。2016年BMJ一份研究显示，九年间在FDA从事血液肿瘤学药物审查的55名雇员中，共有26名选择转行，而其中15名就职于生物制药行业，或为其提供咨询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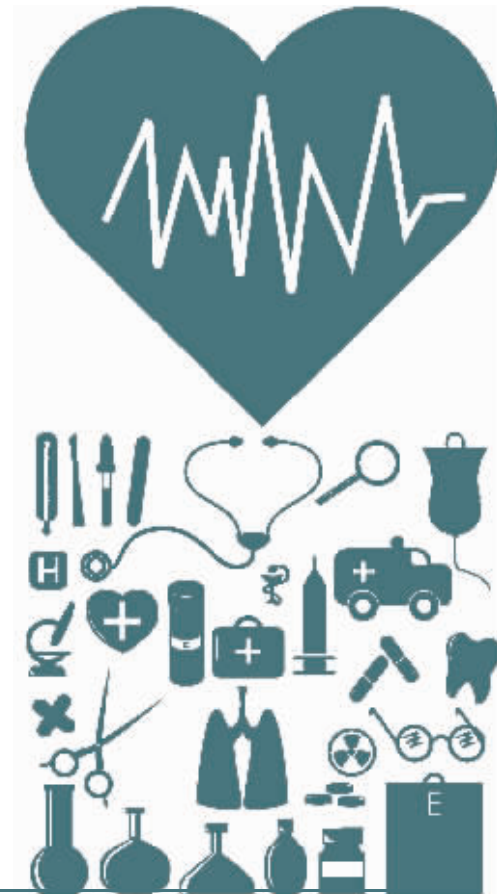
现任局长Scott Gottlieb自己也“深陷药企的关系网之中”，上任前曾长期担任医药公司和生物医药企业的顾问和董事会成员，还曾是生物医药风投公司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的合伙人。有分析认为，Scott Gottlieb可能成为FDA史上与业界联系最紧密的局长。

FDA的这道“旋转门”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博弈，正如BMJ论文合作者、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血液肿瘤学家Vinay Prasad所说的：“当你离职后的头号雇主坐在你对面时，你就不会成为一个严格的监管者。”

提速的审批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肆虐，FDA严格的审批制度被迫“提速”。在此之前，一个公司通常需要花费5亿美元资金，用12—15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新药从实验室走入市场。

此后，FDA的新药审批时间一缩再缩，从1987年的33个月迅速降到1992年的19个月，而到了1996年部分药物的审批时间只需10周。目前，FDA有四种新药审批通道，包括加速审批（1992）、优先审批（1992）、快速通道



(1997)、突破性疗法通道（2013）。

刘向东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由于美国专利制度的保护，医药市场上的药价较高，而很多仿制药难以上市。特朗普上台后，继续推行放松监管的政策，要求FDA加快新药审批速度。FDA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致立场，试图通过医药市场内部的竞争来压低价格。

FDA现任局长Scott Gottlieb曾提出，FDA对药物疗效和安全性过于追求统计学意义的确定性，给新药上市带来阻碍；相比新药，已经通过审批的老药竞争不够，使得仿制药开发成本从过去的100万美元升高到现在的2000万美元。

此后，治疗癌症、心脏病、基因疾病的药物纷纷加入到“快速审批”的大军中，FDA也随之收到众多亟待审批的药物，这对FDA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提出巨大挑战。审批时间的缩短在一定程度上让一些救命药加速上市，解决了部分病患的燃眉之急，但也因为审批不严谨而造成了对公众健康的损害。

2009年上市的武田Uloric，是近40年来FDA批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高尿酸症的痛风药物，但今年却被美国消费者团体Public Citizen请求下架并撤出全美市场，称“有充分证据表明Uloric造成的严重心血管损害超过了其所有的临床收益。”

据统计，1993—1996年，FDA批准上市的药物有1.6%最后因为安全问题被下架；而到了1997—2000年，FDA批准的药物有5.3%被召回；再到2012年，全年就有价值5亿美元的问题医疗设备退市。

随着新药审批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新药排队候审，这对FDA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战。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从1992年开始，FDA推出了《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此后不断完善巩固，并继续推出《仿制药使用者付费法案》《医疗器械使用者付费法案》等，使用者付费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帮助FDA完成其保护公众健康和推动医疗创新的使命，这些费用能够补充FDA的资金缺口。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汤艺甜/文 李燕/制图

观察

“女婿”财长：土耳其的隐形接班人

比起“土耳其新任财长”“埃尔多安女婿”的称号似乎更加具有争议性。本周一刚刚连任总统宣誓就职的埃尔多安就已经接连发力，精简内阁、颁布新行政法令，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埃尔多安将财长的职位安排给了自己的女婿——拉特·阿尔巴伊拉克一事。

据了解，现年40岁的阿尔巴伊拉克是埃尔多安大女儿埃斯拉的丈夫，两人于2004年结婚。他拥有纽约佩斯大学的金融管理MBA学位，可以说在金融领域拥有一定的实力。而婚后十年，担任私人控股公司Calik Holding首席执行官的阿尔巴伊拉克在2015年11月的内阁中，顺利拿下了能源部长的职务，进而进入议会。

阿尔巴伊拉克坐上财长的位置瞬间引爆了土耳其里拉。在新任命公布

后，里拉兑美元的汇率暴跌3.8%。而自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累计贬值超过20%，也一度导致进口商品大幅涨价。

市场的担心在于阿尔巴伊拉克担任财长之后，他与埃尔多安之间的关系是否能让阿尔巴伊拉克在未来的决策中保持独立。

埃尔多安一直是个坚定的低利率支持者，他曾向土耳其央行施压，要求在大选前削减借贷成本，以刺激信贷增长和基建。而在上个月，阿尔巴伊拉克还在选举活动中警告，里拉的暴跌是源自境外力量的“操作”。但投资者认为，这是对土耳其经济过热和利率过低感到担忧的产物。

毫无疑问的是，阿尔巴伊拉克已经与埃尔多安站在了同一边。虽然裙带关系令阿尔巴伊拉克赢得政治

资源的说法此起彼伏，但与土耳其政府关系密切的观察人士则表示，阿尔巴伊拉克是政府中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他使用流利的英文让外国同行印象深刻。

阿尔巴伊拉克飙升的存在感一度让反对党和人民党领袖里达欧卢将他称之为“影子总理”，更有报道称，阿尔巴伊拉克一直都被视为埃尔多安的接班人。过去的几年，阿尔巴伊拉克经常陪同埃尔多安出访，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政策会议，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连在2016年轰动一时的土耳其政变中，阿尔巴伊拉克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阿尔巴伊拉克正与埃尔多安一同在海滨城市马尔马里斯度假，而在未遂政变后与外国记者举行的首次见面会上，阿尔巴伊拉克也第

一个站出来披露政变的幕后故事。

但阿尔巴伊拉克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刷存在感的“花瓶”。据了解，在步入政坛之前，阿尔巴伊拉克执掌的Calik Holding就是一个业务涉及纺织业、能源业以及媒体领域的综合型集团。2011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23亿里拉。

除此之外，阿尔巴伊拉克还是土耳其《每日晨报》和A-Haber电视频道的所有者，而在担任能源部长之前，他还常常为《每日晨报》撰写专栏文章。

而今，阿尔巴伊拉克从媒体跨越到能源，又从能源跨界到财政，阿尔巴伊拉克能否将崩溃的里拉拖出泥沼，能否拿出合理的财政政策拯救土耳其已经成了考验他的重要议题。能否摘掉“女婿”的帽子或许就在此一举了。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杨月涵